

《百年民生》丛书

● 陈鸿清 编著

百年树人

—— 中国教育问题

THE PROBLEM OF EDUCATION

- 必须关心的问题
- 必须直面的现实
- 必须了解的政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G52
C45

● 陈鸿清 编著

百年树人

—— 中国教育问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树人:中国教育问题/陈鸿清编著.-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1

(百年民生丛书/陈鸿清主编)

ISBN 7-5078-1931-0

I. 百… II. 陈… III. 教育事业-研究-中国
IV. 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6016 号

《百年民生》丛书

百年树人

——中国教育问题

编 著 者	陈鸿清
责任编辑	王先豫
版式设计	周 迅
封面设计	耕者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68036519 68033508〔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集好照排公司(68961681)
印 刷	北京市四季青印刷厂
装 订	北京昌平振昌装订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70 千字
印 张	6.75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8-1931-0/Z·327
定 价	12.0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图书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百年民生》丛书编委会成员

主 编：

陈鸿清

副 主 编：

石 也 李泊言

编委会成员：

陈鸿清	李泊言	石 也
朱芳芳	郑金火	陈翠芳
李正峰	贺 丰	刘 洪
唐志刚		

总 序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 100 年像 20 世纪的 100 年那样令人悲喜交加，荣辱共存。100 年来，中国土地上饱经各种灾难，尝尽各种辛酸，同时，也领略了各种喜乐。饱经各种灾难的中国人早晚都盼望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强大，都盼望着雪耻。这一盼就盼了近半个世纪，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人们才看到了希望。然而，在希望与奋斗的热情中，中国又陷入了多年迷途。百年过去了，经历了曲折的路途，我们该回头看一看了。

看看这一百年来，中国人活得怎么样？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关注的是什么？

正是基于对中国民生问题的关注，我们把“百年民生”问题作为一个兴趣点，以近年来民众最为关心的话题，即民生问题作为出发点。这些话题中有些是老话题，甚至是几千年的话题；有

百年树人\2

些是 20 世纪刚提出来，而还没有完全解决的话题。这些话题在新的世纪还会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内。基于此，我们把教育、投资理财、医疗改革、社会保障、保险等问题作为本套丛书的主要内容，并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梳理与审视，对现实的分析与讨论，通过借鉴国外的经验，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相信这些话题也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

陈 鸿 清

前 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历来重视“树人”。恰逢 20 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来临，正是回顾“百年树人”的极好时机。

综观 20 世纪，各国都试图寻找最有效的发展途径和最便捷的快速增长方式，努力寻找解决本国财富与知识增长、提高民众生活的“安全出口”。由于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各种背景的不同，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他们完全一致的发展道路，完全相同的发展轨迹。但是，有一点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这就是在诸多的“出口”中，教育成为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安全出口，不管是作为二战之后的战败国的日本，还是作为战胜国的美国；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几乎所有经济发展较快，民众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国家，无一不把教育当做他们解决问题的重点。而对教

百年树人\2

育的重视也给这些国家带来较高的回报，国民素质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加快发展的科学技术等等，无一不与教育的发展有关。

重视教育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今天，在即将跨进新世纪门槛之际，我们能不能承接这一传统，能不能解决长期以来的教育投入徘徊不前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教育的平等问题，能不能解决教育体制滞后于经济发达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接受进一步教育的问题，正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需要不断地被提出来。

本书试图通过对百年来中国教育所走过的路程作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当然，回顾本身并非目的，我们只是想看看，这100年来，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事情还没有做，应该如何去做。在书中，回忆只是一个序曲，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才是目的。为了更好地借鉴与比较，我们介绍了一些国外关于教育改革与教育发展的情况，以期从中可以得到启发。

中国的教育还在思考、前进，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没有停止脚步，我们期等着能看到中国在新的百年中能有更大的发展。

陈 鸿 清

目 录

磕磕碰碰一世纪	1
满目疮痍话教育	1
淘尽泥沙始见金	16
一波三折改革路	26
事实胜于雄辩	39
如果没有 1977 年	47
追忆非常岁月	
——“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影响	47
难忘的 1977 年	56
开辟了另一方天地	65
远行的枷锁	71
谁来投资	72

百年树人\2

学考试还是培养能力	80
围墙内的问题	98
他们学到什么	107
种豆得豆	116
教育与综合国力	117
国民素质的忧思	127
环顾四周	134
美国的教育	135
日本的教育及其改革	149
突破重围	157
潮起潮涌的教育改革	157
解决老问题：谁来投资	160
教育产业化	170
让民办教育创造奇迹	182
从优化结构优化教育	193
教育的开放性	200

磕磕碰碰一世纪

满目疮痍话教育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似乎没有哪个世纪可以像 20 世纪这样，让人有那么多的感受，羞辱与荣耀、下跪与站立，在眼泪与笑声中一起完成了。处于变动中的中国教育同中国的其他问题一样，也是一波三折，荣辱兴衰历历在目。

20 世纪初年，沿袭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仍然主宰着读书人，寄托着读书人的希望。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全凭一份八股文式的试卷定夺，科举制度在深层次上主宰着中国人的生活，维护着封建统治。但是，20 世纪来临时，这种制度发出的腐烂味，已经让看到其弊端的仁人志士不忍再闻了。

当时，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试验品。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从“瓜分主义”改为“门户开放”。腐败的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从 1901 年起，开始实行一系列“新政”。教育改革成为“新政”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改革教育实行所谓的“新教育”。

1901 年，张之洞、刘坤一等提出递减科举取士名额，以学

百年树人\2

堂生员补充的建议，开始对科举制度提出挑战。

1903年，张之洞等人在《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中提议“从下届丙午起，每年递减名额的三分之一”，试图将科举与学校合一，并逐年减少科举名额，作为停止科举而办学堂的过渡。

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等人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校。迫于形势，清政府于当年8月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在1901年至1906年间，由于朝野上下的反对，也由于不得不顺应历史的潮流，自隋朝起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完全停止，旧的中国教育开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建立新的具有近代特征的学制，是这一“新教育”的一个主要方面。为了确立新的学制，清政府先后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两个学制的实施为中国新型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学制颁行后，各地纷纷根据清政府颁行的学制建立新学校，各类各级学校获得了发展。据清政府统计，到1909年，全国有小学堂51678所，中学堂460所，高等学堂127所，师范学堂514所，各类实业学堂254所。人们开始认识到现代科技的重要性，不少学生把目光转向西方。1906年，大约有13000名学生去日本学习。中国采纳了日本流行的观点，即向西方学习技术与实践，向传统学习道德及行为准则。此外，在教学方法上，也突破了以往的“八股文”式教学。新学校提倡启发式教育，在小学阶段注意废除体罚，在各级课程中引进了不少有关“西学”的教科书。这一切，表明教育在清末有所进步。

但是，在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根本变化的条件下，教育的改革不可能彻底，加之，整个学制改革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所以，从表面上

看来，这个时期所施行的学制虽然形同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学制，但实质上仍然是受封建思想的支配的，表现出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中华民国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直至1949年的30多年内，中国一直处于动荡中。头15年，军阀混战，随后是北伐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继之8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应顺历史潮流，在民众呼声中成立。这是一个暴风骤雨式的变革的时代。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文化的变革和军事、政治的变革是并行的。

民国初年，西方的思想，特别是民主思潮和反独裁、提倡科学的思想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教育，使国民义务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小学生人数从1912年的2776373人，到1919年发展到5722213人，增加了一倍多。中等教育的规模也有所扩大，1915年中等学校有444所，学生69770人，到1922年统计，已有中等学校547所，学生103385人。

在中国教育史上，对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思想发生重大影响的，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五四”时期是中国教育发展进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教育改革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教育领域，掀起了改革传统的封建教育，倡导实用、科学，积极学习、引进西方近代教育的热潮。“五四”时期提出过诸多教育问题，如学制、教育内容、教育改革的方向等等，但最受人关注的是有关“教育救国”的争论。

教育能否救国的问题，早在“五四”以前就提出过，不过那时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教育思想与封建主义教育思想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批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与封建社会保守分子的斗争。“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斗争的实质有了新的内容与意义，在五四时期，教育能否救国的争论，已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之间的斗争。

关于教育能否救国的问题，可以追溯到1919年7月20日。当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将攻击的主要矛头指向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李大钊等人。在这篇文章里，胡适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胡适当时为何提出这一问题，为何将矛头指向李大钊等人？胡适的得意门生唐德刚在其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一书中，多少披露了一点胡适本人后来对这一场争论的背景描述。胡适说：“我曾向我的同事们建议，我们这个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我并且特地指出我们要‘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看来，胡适把教育问题看作其改良中国的“非政治”的“文化”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胡适同时说：“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谈点较基本的问题。我的这项新尝试自7月开始，并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

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稍加批评。”面对胡适提出的“问题”与挑战，作为共产主义思想战线上代表人物，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随即针锋相对地在《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了《再论问题和主义》一文，透彻地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宣扬理想主义，两者并不矛盾。“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希望。”而所谓“根本解决”，“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家庭制度问题，都可以解决。”接着，张东逊等人附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十分起劲地宣扬“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的观点，把教育当成解决中国问题的良药妙方，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即是教育问题，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与此同时，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蔡元培于1922年提出“教育致于万能”、“教育救国论”的观点。针对张东逊、罗素等人的上述观点，毛泽东1920年12月1日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一封信中，尖锐地指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认为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奢谈教育救国是一种空想。例如，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这三者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之中。这就说明，教育权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试图通过教育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不大可能做到的，他说：“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那么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

怖的方法。”恽代英还在1923年10月27日的《中国青年》第2期上针对蔡元培的观点也发表《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一文,指出,中国的革命不只是一是要打倒国内的军阀,而且还要打倒外国势力,在军阀混战、外强入侵的中国,读书是救不了国的,救国的根本只有革命。其后,恽代英针对“国家主义派”的“教育救国论”思想,开展了更加尖锐、更加鲜明的批判。他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得出了与毛泽东、李大钊等人基本相同的结论:不良的教育、道德乃是由于经济压迫所致,因而,他重申“要用教育救中国,需先知中国究竟要如何才能得着经济独立,——才能得救”;而“要求经济的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

“五四”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如此鲜明、自觉地强烈反对形形色色的“教育救国论”,并不是出于对教育事业的轻视,更不是教育虚无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深知教育对国民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实践的巨大作用,而且已经比较深刻地看到了当时社会不良的教育对中国民众,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的残害。他们站在更高的角度,深层次地观察、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包括教育问题,深刻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社会根本问题,迫切寻求中国富强的根本性解决办法。因此,他们不像一般的社会贤达那样就教育论教育,而是透过社会现象、尤其是透过社会的经济制度来看待教育问题的本质。

打倒封建主义,赶走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主题。“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只要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大众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等主要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包括教育问题在内的其他次要矛盾,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教育主权问题,即是一个明显不过的例子。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进行民主改革,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法令。但是,由于中国资产

阶级的软弱性和对帝国主义的幻想，政府的教育法令中，没有也不可能涉及收回教育主权的问题。不久，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官僚、买办集团篡夺政权以后，封建复古思想和帝国主义买办文化在中国大地上继续横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伴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而来的，作为帝国主义对华施行文化影响、蚕食中国教育主权的重要机构——教会学校，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社会动乱严重影响政府教育机构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据统计，1920年在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数达214254人。

教会学校早在19世纪后半期即已大量出现。清政府对外国人创办的这类学校除以不给奖励作为限制之外，一直采取放任态度。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新教育迅速发展。教会学校为寻求继续在中国生存的方式，应付新教育的挑战，努力完善独立的教会体制。不少教会学校有自己的培养目标，设置不同于政府所办学校的课程，对于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则借口违反基督教教义而严加抵制。为方便毕业生出国留学和就职于与西方商贸有关的职业，教会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比较重视英语和某些自然科学课程，使在这方面基础薄弱的官办学堂学生很难转入教会学校，从而精心发展起自己的各级学校系统。教会小学的毕业生进入教会中学，绝大多数教会大学学生来自教会中学，到20世纪20年代，自成系统的教会教育体制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中国现代教育史的发展进程，充分证明了“五四”时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在中国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教育救国仅仅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幻想的英明预见。如果说，教会学校仅仅是中国丧失教育主权的一种“温和”的方式，那么，以后的历史则进一步以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一步步地证明着这种预见：随着国内反动势力的日趋堕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入侵，伴随着中国主权的一步步丧失，中国的教育主权也一天天丧失，